

流亡重庆的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之关系

杨 副 军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一些长期在华从事反日独立运动的韩国党派团体也相继迁来重庆。这一时期先后在重庆活动过的韩国党派团体有十余个。它们之间的分合改组，纷纭复杂，对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具有重要影响。

綦江统一会议与韩国独立党的改组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在中国长期坚持反日独立运动的韩国志士曾多次酝酿过统一，但因内部党派林立，纷争不息而未成功。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影响，联合与统一的问题再度引起各流亡党派的浓厚兴趣。至武汉沦陷时，在中国关内地区从事反日独立运动的党派团体，先后结成了两个具有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联盟，一个是由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革命者联盟四个政党组成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另一个是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三个政党建立的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光复阵线）。

为求得各党派之间进一步的合作与统一，韩国国民党理事长、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长金九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后，即赴民族革命党本部，商讨政党统一问题，提出解散所有党派团体，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单一大党的主张。民族革命党对于金九的提议，表示出积极的态度。此时，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委员长玄河竹也由延安抵重

庆。持社会主义政治观点的玄河竹虽然不赞同那种解散现有组织成立单一政党的主张,但仍然致力于各党派之间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希望韩国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的各政党,在反日民主的共同纲领下密切合作,共举复国大业。

1939年3月,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的领导机构随韩国临时政府迁来重庆綦江县后,金九曾提出统一方案,但遭到了来自韩国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统一虽好,但与民族战线联盟内的共产主义者合并为单一政党,恐因主义相异,无法维持组织的统一。特别是该党理事和理论权威赵琬九,对共产主义持彻底的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金九与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金若山以个人名义联合发表公开信,阐明对统一运动的主张。他们认为:几十年独立运动因派别斗争导致惨痛失败,这固然是长期侨居海外,远离国内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而主要的原因还是民族觉悟不高,未能正确掌握和灵活运用民族革命战略和策略。他们向在渝各党派发出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建立统一组织,以集中发挥全民族力量的呼吁。金九与金若山暂时抛开政治上的歧见,为建立统一的民族组织,提出了十条共同纲领。纲领主张必须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建设自主独立的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制;在经济制度方面,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禁止土地买卖,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可把工业、运输、银行及其它产业部门的企业收归国有,并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在韩国的一切财产;国民应享有言论、出版、集合、结社、信仰的自由;减少工人劳动时间,举办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事业;男女平等;实行国民义务教育等。金九、金若山要求在中国关内地区活动的一切韩国党派团体,在共同纲领下,停止派别斗争,解散现有的政党团体,不分主义和党派建立统一的组织,以集中力量,对付民族的共同敌人。他们强调:“各团体所标榜的主义虽然不一样,但对于现阶段的朝鲜革命的政治纲领和抗战方式则完全一致。尽管如此,倘若分别建立四人一党、六人一派的各种团体,必然要分散斗争力量,并导致相互对立,无法开展对敌的猛烈斗

争。这是不能允许的。”^①

金九、金若山的联名公开信发表以后，民族战线联盟内的最大政党民族革命党，于9月间在重庆召开了第四次全党代表大会，通过了《确定关于海外运动再统一政策的决议案》，确定了参加统一政党的原则和策略。韩国国民党也在綦江召开了全党代表会议，在临时政府主席、韩国国民党元老李东宁主持下，通过了有关韩国国民党参加统一政党的决议。这就为綦江统一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1939年8月27日，韩国七个政党的领袖齐集綦江县，在城内的瀛山宾馆召开了“七党统一会议”。尽管参加会议的各党领导人对统一问题均抱有热情，但对统一的形式却各执己见。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青年前卫同盟两组织的代表提出：统一后的新党应是一个民族联盟性质的集合体，各政党统一后仍可保留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他们不愿解散其组织和改变共产主义信仰。这两个组织的主张不为其他五党所接受，退出统一会议，“七党统一会议”遂告失败。留下来的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革命者联盟等五党代表经过磋商，于9月22日在綦江继续召开统一会议（称“五党统一会议”），几天后达成了有关建立统一新党，解散各自组织的八条协定，各党领导人均在协定上签字。但刚过几天，金若山以民族革命党和朝鲜义勇队中的部分成员不愿放弃共产主义为由，在提出重新修改八条协定的要求后，宣布退出统一运动。^② 朝鲜革命者联盟委员长柳子明虽然主张建立统一政党，但鉴于民族战线联盟内的政党七已去三，也宣布退出统一会议，“五党统一会议”也告失败。

此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由以韩国国民党为主体加上光复阵

① 杨昭全：《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斗争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628页。

② 金九：《白凡逸志》，台北1969年版，第200页。

线内的另两政党共同支撑着。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所属各党派相继退出綦江统一会议，使李东宁、金九等人争取通过各党派的统一合并，扩大临时政府基础、壮大临时政府力量、削弱共产主义在独立运动中的影响的努力遭到挫折，他们只好转而先求光复阵线内的三党统一。临时政府主席李东宁提出：先建立一个强固纯粹之民族运动阵营，然后再谋全民族的大统一，希望光复阵线内的三个政党先行统一。^①

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的政治纲领与韩国国民党差别不大，经济上也多仰仗于后者，但他们之间对统一的方式却各持主张。朝鲜革命党的中坚人物李青天、柳东说、金学奎、崔东旿等完全追韩国国民党；而以赵素昂、洪震为代表的韩国独立党则倾向于以党派联合的形式实现统一，认为这样便于团结和吸收韩国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过，韩国独立党考虑到自身政治力量薄弱、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并未坚持自己的主张。

被誉为韩国独立运动元老和导师的李东宁在綦江病逝一个多月后，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在綦江再度召开统一会议（“三党统一会议”）。1940年5月8日，三党在“解散宣言”上签字，宣布三个政党同时解散，组成新的政党——韩国独立党。5月9日，韩国独立党发表《创立宣言》，称该党宗旨为：“当以革命的手段，扑灭暴日侵夺势力，完全光复我国土、主权。在政治、经济、教育均等基础上，建设新民主国家，因而确保国民各个的均等生活。外而实现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进而踏向世界一家的路线。”^②同时，韩国独立党的纲领是：光复国土主权，建立大韩民国；保卫国土、国国利；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不分阶级、性别、教派，实施普选制，实现国民参政平等化；土地及大生产企业国有化；国民秤

① 引自《韩民》，1940年第1期。

② 杨昭全，前引书，第374页。

工作权利均等化；实施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国民义务兵役制七条。^① 独立党拟定行动方针：积极宣传党纳，唤起民族的革命意识；集中海内外民族革命力量，实施光复运动总动员；训练武装斗争；拥护支持临时政府；加强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参加中国抗战。在独立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金九被选为独立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与执行委员列的还有监察委员会，李始荣、公镇远、金懿等人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这时远在美洲的韩侨团体夏威夷爱国团、夏威夷团结会也回电金九，同意解散现有组织，另组韩国独立党夏威夷支部。^②

三党统一后，韩国临时政府即着手改组。1940年秋，临时政府由綦江县湾镇迁到重庆近郊的土桥镇后，便产生了由金九任主席的第十五届临时政府，李始荣、曹成焰、赵琬九、赵素昂、朴纯、宋秉祚、车利锡等七人组成国务委员会，李始荣任财务部长赵琛九任内务部长，赵素昂任外务部长，柳东说任参谋渴长，李象万任检查院长。原朝鲜革命党和独立党均有人担任各部院要职。

綦江统一会议的结果，对加强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力量的统一，进而争取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和援助起了重要的作用。

韩国在渝两大党合作关系的建立与民族战线联盟的解体

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内的几党退出綦江统一会议后来，与新的韩国独立党形成对立。朝鲜民族革命党是民族战线联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党，同时又与中国国民党有使用关系，其控制和掌握的朝鲜义勇队，是朝鲜独立运动在关内地区唯一的武装组织，得到

① 杨昭全，前引书，第374页。

② 金九，前引书，第200页。

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认可一支持。1940年4月，民族战线联盟为获得国民政府的进一步支持，将设在桂林的朝鲜义勇队队部迁到重庆，民族战线联盟的声势日显壮大。

新成立的韩国独立党虽然支撑着一个非常脆弱的流亡政府，但由于临时政府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明确承诺而处于很艰难的境地。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对在中国建立韩国临时政府提出异议。陈对蒋介石建议说：“该国党派分歧，若运用不善，徒致偾事。不知先扶植其革命势力，俟该国其党派取得确实领导地位后再议为要。我国政治环境已不单纯，若许其在我国境内建立政府，在目前政府环境上似属不宜，故认为目前无成立之必要。”^① 陈诚进而主张要加强朝鲜义勇队的组织，改进其计划，增大其效力。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制订了扶助朝鲜义勇队的组织规程以后，韩国独立党感到中国方面对民族革命党的支持，将会使自己陷于一种无所作为的境地，因而提出将临时政府移往美国以寻求支持，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并乘势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成立韩国光复军的计划案。^② 蒋介石鉴于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和独立党人在韩国的革命历史，不顾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反对，亲自批准了临时政府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的要求。^③

1940年9月17，韩国光复军司令部在重庆正式成立，原韩国临时政府军务部长李青天任总司令。这对以朝鲜民族革命党为主导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试图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去实现以朝鲜义勇队为骨干的武装统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与临时政府相抗衡，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几党决定加强朝鲜义勇队的武装，以求得进一步发展。1940年10月10日，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就朝鲜义勇队成立两周年发表宣言称：“关内的朝鲜革命者已经大多在枉

①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第772卷14号。

② 金九，前引书，第201页。

③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1991年编印。第106页。

盟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时由我们的战斗队伍朝鲜义勇队二年来的实践斗争,更加巩固了此种团结,给关内运动的统一奠下了不可磨灭的基础。”“本盟迫切需要朝鲜义勇队立即在中国的援助下武装起来,扩大活动领域,进出敌人后方,吸收一切革命青年附着到自己周围,同时,努力争取敌军中的士兵与敌后同胞,不断地壮大发展成为民族武装的一支坚强势力。”^①

韩国独立党在重庆影响日渐扩大,民族战线联盟内部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以金奎光、朴健雄为领导的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以王海公、金学武、崔昌益为领导的朝鲜青年前卫同盟,因不满民族革命党长期所处的盟主地位,于1940年12月各处解散原有组织,联合民族革命党内一部分脱党人员,成立了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同明,选举了以金奎光、朴健雄、李贞浩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与朝鲜民族战线联盟脱离关系。

不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青年前卫同盟的结盟关系维持的时间并不长。1941年,朝鲜义勇队第三支队从重庆出发赴第一战区,在洛阳经过短期整各,在八路军总部安排下,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由于朝鲜青年前卫同盟的不少骨干系中共朝鲜义勇队支部的秘密党员,其成员大多集中在华北敌后,因而与原民族解放同盟的主张日渐相左。在这种情况下,留守重庆的民族解放斗争同盟中央机关的部分人员为了与朝鲜青年前卫同盟划清界线,于1941年11月发表宣言,宣布恢复原民族解放同盟的名称,并重新确立了该组织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政策,主张把韩国一切反日革命力量集中于临时政府领导之下,去实现反日民主纲领。但仍有少部分成员在金仁哲的带领下以民族解放斗争同盟的名义继续活动。

自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退出民族战线联盟以后,该联盟的牌子仍由朝鲜革命党撑着,此外还留下朝鲜革命者

^① 1940年《朝鲜义勇队纪念特刊》。

联盟一个团体。但由于以柳子明为委员长的革命者联盟的成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并不愿受民族革命党的束缚，不时显出独立性，因此，作为与临时政府相对立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实际上已徒有其名。

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长期分裂状态，重庆各界予以了很大的关注，并且深感忧虑。重庆《新华日报》在纪念韩国“三·一”运动23周年的社论中分析其分裂的原因是：“侨居国外的朝鲜人民，脱离国内的事实太远，其体验实际活动，未必完全亲切。其中一部分专门从事政治斗争的人士，也不能经常返国，甚至无法与国内取得密切联系，这就使得朝鲜国外的政党，由于国我条件不同，曾经发生门户之见、宗派之争，遂令国内人民引以为忧，而世界各国革命者，也均寄与这类现象以同情。”^①社论呼吁朝鲜临时政府、朝鲜义勇队、韩国光复军、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华北青年联合会等组织团结起来，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共底于成。1941年4月，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郭泰祺同时约见韩国独立党和民族革命党的领导人金九和金若山，希望两党团结合作。此时，民族革命党感到，继续拒绝与韩国独立党的合作，继续反对韩国临时政府，将有丧失国民政府支持的危险。1941年5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七次中央会议，确立了参加临时政府、与韩国独立党合作的方针。12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重庆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大会对韩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进行了新解释，认为：朝鲜革命的性质，是以对外推翻异族统治，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立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朝鲜为其原则的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革命。该党的斗争纲领是：颠覆日本帝国主义之统治，建立朝鲜民族独立之民主共和国；召开国民会议，制订国民宪法，实施普遍选举制；肃清旧王朝封建残余日本帝国主义之走狗；没收朝鲜境内之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亲日走狗之一切财产、权利、

① 《新华日报》，1942年3月1日，

抗日战争研究

2
1994

特权；保护增进反法西斯的朝鲜人之正当经营；厉行土地革命，将耕地分给小作农民；缩短劳动时间，实施社会保险；男女平等；国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国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保险，概由国这经费实施之；联合世界上平等互助之民族及国家，促进全人类之和平幸福。^①

朝鲜民族革命党第六次全党大型开会期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民族革命党感到：临时政府有可能被同盟国家承认，中国政府对临时政府的实际支援势必加强，因此，此届大会将参加临时政府与韩国独立党协商统一作为重要内容。大会宣言中说：“本党决定参加临时政府，并予以支持，同时主张扩充临时政府为足能代表朝鲜民族全体之机构。且希望召开各革命团体及革命群众之代表大会，使临时政府成为朝鲜革命大众之最高战斗指挥部。”^② 民族革命党参加临时政府，使韩国临时政府的声势大振。

自韩国光复军建立后，韩国独立党企图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将朝鲜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但此举由于遭到国民政府军委会侍从室和军委会政治部的拒绝只得作罢。民族革命党作为一种对对策也提出将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合并起来，统一成立以义勇队为主体的朝鲜民族革命军的主张，指责“韩国光复军”名称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缺乏积极的革命意义。此建议一同独立党的竭力反对。在民族革命党宣布拥护并参加韩国临时政府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集中韩国抗日力量，促进韩国独立运动，扩大临时政府的国际影响起见，认为朝鲜义勇队已无脱离临时政府而单独存在的必要，于1942年5月15日令其改编，全体队员一律编入韩国光复第一支队，民族革命党中央书记、朝鲜义勇队队长金若山被委任为韩国光复军副司令。至此民族革命党感到临时政府已成为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最高领导机构，为了换取独立党方面的信任，民族革

① 《朝鲜民族革命党第六届全党大会宣言》，藏重庆市图书馆。

② 《朝鲜民族革命党第六届全党大会宣言》。

命党在军事统一完成后,以利于全民族的总团结为由,宣布将已名存实亡的朝鲜民族战线同盟解散。

朝鲜民族革命党参加临时政府后,临时政府议政院于1942年10月25日,在重庆召开第三十四届议会,产生了由四个党派联合组织的新临时政府。在补选后的48个议席中,韩国独立党25席,民族革命党13席,朝鲜革命者联盟(也称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总联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非党派人士共占10席。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洪震担任了议会议长。在选出的10名国务委员中,除金奎植、张建相是民族革命党人外,另8名国务委员职位全被独立党所囊括,由金九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掌握临时政府权力。临时政府的9个部中,除宣传部和学务部由民族革命党担任正副部长外,其它如内务、外交、军务、法务、财务、交通、生计各部部长均由独立党人士担任,其它党派获得了少数次长职位。李承晚博士被委任为驻美外交委员长。

以韩国临时议政院第三十四届议会为标志,韩国临时政府终于结束了长期一党掌权的状况,形成了以独立党和民族革命党为主体的多党派合作反日的局面。在这次会议中,虽然民族革命党关于废除由临时政府侨居地之侨民代行国内人民选举权制和取消道别选举制,代之以人数为标准的混合选举制的提议为独立党所拒绝,但作为一种妥协,韩国独立党也取消了在韩国光复军内设立的独立党特别党部。

统一运动的再度失败与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改组

民族革命党进入临时政府,扩大了临时政府的基础,但在政府内独立党多了一个对手。其它政党在这两党之间活动。韩国独立党以一批在韩国革命历史上有过革命业绩的老人为党的主体,因而它被人们视为韩国“三·一”革命的正统继承者和独立运动的主流。同时,它与中国国民党有着自民国初年就建立的历史关系,更

易得到中国国民党的信任和支持。而民族革命党，在其民族主义性质的纲领中，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易于为广大流亡青年所接受。另外，民族革命党的领导层有大学以上学历者占了 54%，接受过国外教育者人数比独立党高得多，领导层比独立党年青，整个素质明显强于独立党。民族革命党同国民党军方关系也比较密切。

在改组临时政府之初，独立党和民族革命党一度进行过两党合并的谈判。但由于双方条件隔阂太远，独立党又坚决拒绝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族革命党党员参加合并后的新党，谈判未获成功，两党又重新陷入对立状态。民族革命党参加临时政府后，其力量因朝鲜义勇队被合并到韩国光复军而遭到很大削弱。义勇队中民族革命党成员多数对义勇队被强令合并强烈不满。相当多的民族革命党人认为，韩国独立党是一个保守、顽固的政党，民族革命党人参加临时政府，是背弃原则，葬送自身的发展。许多民族革命党人进入华北敌后，看到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力量迅速壮大，感到寻求中共的支持，走中国共产党式的道路才是争取彻底独立，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新韩国的正确道路。基于以上原因，部分民族革命党人虽然形式上仍与重庆的民族革命党保持联系，但实际却渐渐与其疏远。这部分人几乎占了民族革命党党员的一半，是民族革命党中最活跃的中坚。他们的离心使民族革命党内部出现裂痕。1942 年 7 月中旬，在晋东南的民族革命党人与来自延安等地的共产主义者一起，开会宣布华北“弱朝鲜独立同盟”，并同时将朝鲜义勇队更名为“朝鲜义勇军”。朝鲜民族革命党中央委员金科奉、朴孝三分别担任了华北朝鲜独立同盟主席和朝鲜义勇军司令。此后，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领导下，成了华北 20 万韩侨的一支革命中坚力量。

民族革命党总书记金若山见该党在华北的影响日渐削弱，为了扩充党势，摆脱困境，又把流离于民族革命党和独立党之间的“韩国独立党统一同志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海外全权委员会”作为争取目标。以金朋濬、孙建为领袖的韩国独立党统一同志会，系

于1942年6月左右从韩国独立党分离出来的少数党员组成。朝鲜民族革命党海外全权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10月，其领袖人物是申基彦、文逸民，其主要成员均系原民族革命党人。以上两个小党因缺乏群众基础，因此除了依附于临时政府内的两大党外，似乎别无选择。

1943年1月8日，在民族革命党的倡议下，韩国独立党统一同志会、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同盟、朝鲜民族革命党海外全权委员会等四党代表在重庆就合并统一事宜进行商议。最后，几方同意以朝鲜民族革命党改组方式实现四党的统一。2月15日，朝鲜民族革命党在重庆召开了改组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为口号，对民族革命党的“六大”纲领进行了较大的修正，通过了四党统一协议，重新议订民族革命党纲领。这次大会虽然仍把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实现国家独立作为主要任务，但与两年前的民族革命党“六大”相比有明显差异：新的纲领放弃了“厉行土地革命，将耕地分给小作农民”和“肃清旧王朝封建残余势力”的主张，这是民族革命党从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的一种明显倒退，其目的只是为了迎合从独立党脱离出的韩国独立党统一同志会的要求。

这次改组大会上选举了民族革命党常务委员4人，中央执行委员13人，中共监察委员5人。由金奎植博士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金若山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书记，从而组成了民族革命党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在民族革命党亟谋巩固和发展之际，韩国独立党内部却因党派统一问题的分歧出现了裂痕。以洪震、赵素昂、柳东说为代表，对韩国党派统一持比较灵活的态度，积极主张统一全体朝鲜革命团体，以巩固和加强临时政府基础，推动韩国独立运动，因此被称为“统一派”。另一派以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赵琬九、朴纯、李始荣等为代表，被党内称为“反统一派”。其实，“反统一派”对在华韩国党派的统一并不一概拒绝，只是对统一的态度较僵硬，提出统一的条件

较苛刻而已，其要害在于使独立党控制临时政府要职的局面下被打破，独立党元老们的地位不被取代。民族革命党几党联合的改组大会结束不久，韩国独立党也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全党代表大会。大会就独立运动的统一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通过了赵素昂等人提出的统一或联合各党派巩固革命阵线的提案，而金九等人的有关提案遭到了否决。在选举中，独立党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金九落选，由赵素昂继任。韩国独立党内派别的对立，导致该党在临时内影响削弱，而使党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些与民族革命党谋求在临时政府具有更大权力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加深了临时政府内部的分歧。

临时政府第三十五届议会期间的党派冲突

1942年10月9日，韩国临时议政院召开了第三十五届议会。但议会召开前夕的国务委员辞职事件和议会期间各党派因选举国务委员发生激烈对抗，使这次议会举行数月之久而无结果，以至韩国临时政府几乎濒于解体。

韩国临时政府部分国务委员辞职事件是由经费问题引起的。临时政府在重庆时期，其经费主要靠中国方面支持。由于物价飞涨，各政党的活动经费十分拮据，韩侨生活时感窘迫。1943年6月，为了接济韩国临时政府，蒋介石批准每月拨入临时政府20万元，作为临时政府副业和韩侨生活费，规定其中3万元作为民族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的活动经费。因手续上的关系，临时政府迟至7月中旬才领到此款。但对独立党猜忌日深的民族革命在7月初却误认为金九早已领到中国方面的拨款而有意不下发，遂于7月12日召开民族革命党常务会议，宣布了“政府公款中饱案”，公开指责金九和赵琬九等人隐匿公款，谋一党之私。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致函独立党，解释拨款迟到的原因后，金九正式向民族革命党提出撤销政府侵吞公款真相文书的要求，并限期答复。当为

民族革命党拒绝后，金九与朴纯、李始荣、曹成焕、黄学秀、车利锡等 7 名独立党籍国务委员向国务委员会集体提出辞职，致使在华活动 20 余年的临时政府瘫痪达 3 个月之久。后经各党派人士奔走斡旋，民族革命党作出相应的让步，金九才宣布复职，从而结束了长达 3 个多月的危机，但这一事件使各党派争夺议会控制权的斗争更加激烈。

在三十五届议会上，民族革命党想要实现的目标主要有三：其一为阻止独立党的强硬派人物入选国务委员会，以独立党温和人物取代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位置；其二增加民族革命党进入国务委员会的名额；其三修改临时约宪。在议会开幕之初，民族革命党的议员就提出了有关临时政府侵吞公款；卫士手枪失窃，严刑逼供有伟人道；交涉光复军活动九项准绳外交失败，及修改临时约宪等弹劾临时政府的四项提案，试图使金九、朴纯、赵琬九等独立党的强硬派人物在选举新一届临时政府的国务委员时落选。此时独立党的干部层中已存在一种对金九不满的，其代表人物有洪震、柳东说、崔东 一 等。民族革命党在会议中采取拥戴洪震排挤金九的策略对独立党起到了重要的分化作用。

临时政府的国务委员按规定由 6—11 人组成。前次议会产生 11 名国务委员，独立党 9 名，民族革命党仅两人。其它两个小政党无一人进入国务委员会，在这次议会上，独立党的实力派人物金九、赵琬九、朴纯等人在党内外的夹击下，为了求得与民族革命党和其它两个小党的妥协，提出除金九为当然国务委员外，其余 10 名国务委员由独立党和民族革命党各占 4 席，朝鲜革命者联盟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各占一席。在涉及国务委员的具体人选时，参加会议的 40 多名议员因选举国务委员的投票方式又发生严重分歧。独立党的元老们担心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自己会落选，因而坚决主张记名投票。民族革命党坚持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在关键时刻，主持会议的议政院长议长洪震宣布退出独立党，裁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此时，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柳东说，中央常务委

同会秘书长崔东等 18 人宣布脱离韩国独立党，成立朝鲜民族革命者统一同盟，由柳东说任干事长。独立党连连受挫，为了避免出现独立党元老们被排挤出临时政府领导层的尴尬局面，独立党议员愤然退出选举，使议会选举无法继续进行。接着独立党方面提出，只要洪震撤消脱党声明，保证金九、赵琬九、朴纯为当然国务委员，独立党要觅人选取金九的临时政府主席一职。事后，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长赵素昂等人意识到这种以牺牲金九为条件的重大让步是非常危险的，不但会使独立党丧失在临时政府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将导致独立党的进一步分裂，因而拒绝在规定的日期，即 1944 年 2 月 5 日履行签字，单方面宣布议会无限期休会。这样，进行了长达 4 个月之久的三十五届议会遂陷于僵局。

对于韩国临时政府内各党派纷争不已的状况，中国方面深为不安。但鉴于主张韩国独立为中国的一贯政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向蒋介石建议：“目前处理方针，惟有先安定其内部，使临时政府之地位趋于稳固，徐图发展打击倭寇之敌后工作。而外交方面，似应斟酌时宜，先行承认临时政府，以坚定其信心。”^① 在调处韩国在渝的党派斗争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认为：“金九在美国尚有韩侨拥护，韩侨有接济；金九与本党有历史关系；金九在韩国有革命历史”。^② 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维护金九和所属之韩国独立党，抑制金若山及朝鲜独立党。为了平息韩国各党派之间的纷争，尽快产生新一届临时政府，国民政府方面分别约见了各党领袖并施加压力，要求各党派团结合作，务必在最短期内产生合法政府。在中国方面的斡旋下，临时议政院的各党派议会又坐在一起继续进行第三十五届议会。

1944 年 4 月 15 日，进行了半年多的第三十五届议会草草宣布结束。旋即又于 4 月 20 日至 24 日召开了第三十六届议会，这届

^① 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第 376 页。

^②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 425 页。

议会中独立党对其他党派的要求作出了部分让步,如修改了1942年通过的临时约宪部分内容,规定了议员任期,增设临时政府副主席,加强对临时政府的财政监察,将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增加为14名等。这次议会只进行了4天,通过了修改的《大韩民国临时宪章》。14名国务委员分配为:民族革命党占4名,韩国独立党占8名,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各占一名。临时政府仍由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金九任主席,增设的一名副主席由民族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主席金奎植担任。为了国际社会显示韩国临时政府的团结与合法性,在议会闭会时,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四党确认修正后的临时宪章为全民族行动的最高准绳;确认金九和当选的全体国务委员为全韩国民族的最高指导者;决心在临时政府旗帜下团结和动员全民族力量开展反日复国斗争;为取得中美英等国的援助,在短期内争取临时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积极努力。

此后,国民政府方面为使韩国临时政府早日得到国际承认并在军事上有所发展,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处理韩国问题之原则》^①,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临时政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

一,对临时政府内的两大党施加压力,促其合作,防止在现有临时政府之外再产生第二个临时政府。二,防止分散多渠道援助各现象,一切援助均以临时政府为对象。三,为避免临时政府内党派林立,政争不止,除韩国独立党和民族革命党以外的政党一律不予承认。四,增加对临时政府的援助经费,规定经遇用途,不准将韩侨生活费移为党派活动经遇。五,废除1940年春中韩双方签署的《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以《援助光复军办法》代之,中方人员全部退出韩国光复军,光复军改隶韩国临时政府。

① 参见秋宪树,前引书(三),第255—257页。

后来，尽管朝鲜民族革命党统一同盟联合部分韩国独立党、民族革命党的脱离人员成立了以洪震、柳乐说、金朋濬为核心领导的新韩民主党，但未对临时政府造成大的震荡。在独立党的倡议下，临时政府内的四党，加上刚成立的新韩民主党，五党领袖于1945年4月又在一起举行了一次没有结果的“韩国五党统一会议”。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日子日益临近，在渝的韩国党派感到返回祖国的日子即将来临，因而临时政府的国际承认问题成了优先考虑的问题。虽然韩国独立党和民族革命党为争夺光复军的控制权有时争吵得相当激烈，但韩国临时政府返国后的命运和在渝各政党归国后的作用尚不可预料，这些因素，又使这些政党聚拢在一起。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驻韩国美军规定：从中国返韩的临时政府成员必须以平民身份回国。急于从重庆返回祖国的各政党领袖，结束了在重庆六年多的流亡生涯，带着无限的遗憾回到韩国，继续国内舞台的激烈角逐。

（作者单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